



环境政治学译丛

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英]戴维·佩珀 著
刘颖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环境政治学译丛

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英]戴维·佩珀 著

刘 颖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英)佩珀著;刘颖译.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

书名原文: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ISBN 7-5607-2906-1

I. 生…

II. ①佩…②刘…

III. 社会主义-关系-生态学-研究

IV. ①D033. 4②Q1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321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75 印张 329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特征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时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道路。因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使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沿着上述思路,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大量边缘性与交叉性新学科的意蕴,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营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等等。就此而言,笔者所指称的



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也是这些诸多正在形成中的新兴学科之一。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环境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而，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部分是基于环境政治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成熟性，部分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自身与时代特点的理解，笔者并不主张急于对环境政治学做出看似明确而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而是更愿意将其宽泛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具体而言，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规定为介于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新学科。依此，我们可以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反灰色的都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

题研究的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对于前者来说,对生态哲学研究已有成果的消化吸收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关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理性元点,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对于后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欧美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的确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二是要争取在研究成果上尽可能广泛而及时地交流与分享。这其中基础性手段当然是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西方国家学者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而它对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在上述两方面意义上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推进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在这第一辑中,笔者选择了生态政治理论方面的《绿色政治思想》(安德鲁·多布森著)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戴维·佩珀著)、环境运动团体方面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克里斯·卢茨主编)和绿色政党方面的《欧洲执政绿党》(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这些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集中展示欧美环境政治学的主要方面,而它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在各自领域中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之一。

当然,如果没有如此多研究基金、学术机构和国内外同行所提供的帮助与鼓励,《环境政治学译丛》的编译出版是无法想象的。由于分别受“中欧高教合作项目”(The 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me)、“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香



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DAAD-K. C. Wong Fellowship)、“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资助,笔者得以先后于1998~1999年在联邦德国吕内堡大学、2002年在联邦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2002~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了欧美环境政治的专题研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EYTP)、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Fok Yingtung Education Foundation)和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则为本译丛提供了主要的财政资助。在本译丛编译过程中,除了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斐迪南·穆勒—罗密尔(Ferdinand Müller-Rommel)、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托马斯·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e)和克里斯·卢茨(Chris Rootes)教授的热情帮助外,还得到了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的迪特·鲁赫特(Dieter Rucht)教授、欧洲议会的皮尔·加尔顿(Per Gahrton)博士和劳伦斯·范德瓦勒(Laurence Van de Walle)女士、哈佛—燕京学社的杜维明先生等的重要建议或鼓励。与此同时,国内同行余谋昌教授、周德明教授、叶平教授、杨通进博士、雷毅博士和朱贵昌博士等,也以不同形式提供了学术帮助与建议。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笔者还应对给予本译丛大力支持的山东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郇庆治

2004年12月于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

戴维·佩珀(David Pepper),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政治理论,相关著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基》、《现代环境主义:导论》和《环境主义:地理学与环境中的批判性概念》等。

内容提要

本书在吸收马克思、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和无政府—工联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推动绿色政治和环境运动前进的且富于挑战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分析。通过确立一种激进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成要素,作者批驳了生物中心主义以及过分简单化的经济增长极限与人口过多等观点,同时也批判了后现代政治和深生态学的绿色方法中的缺陷和矛盾。

目 录

“环境政治学译丛”总序	郇庆治 (1)
译者说明	(1)
中译本前言	(1)
第一版前言	(1)
第一章 红与绿:旧政治还是新政治	(1)
1. 红绿之争	(1)
2. 某些旧政治问题	(11)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绿色分子、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定位 ...	(47)
1. 生态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	(47)
2. 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54)
3. 环境主义和传统政治意识形态	(65)
4. 绿色政治是后现代政治	(79)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环境主义	(88)
1. 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相关性	(88)
2.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100)
3. 资本主义的分析	(115)
4. 环境和自然的含义	(133)
5. 马克思主义和人口—资源议题	(142)
6. 社会—自然辩证法与自然异化	(155)
7. 马克思主义和解放	(170)
8. 社会变革和中介理论	(187)
9. 生态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201)
第四章 无政府主义和绿色社会	(235)
1.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235)
2.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自然关系	(250)
3. 无政府主义者和人性	(258)
4. 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268)
5. 第四世界	(281)
6. 社会变革的无政府主义方法	(294)
第五章 结论：社会主义和环境	(315)
1. 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	(315)
2. 推动生态主义接近生态社会主义	(334)
3. 生态社会主义概要	(354)
4. 实践中的生态社会主义	(357)
5. 结语：红—绿政治前进的方法	(370)

第一章 红与绿： 旧政治还是新政治

1. 红绿之争

十年前，一位朋友让我给由他发起的一个“地球之友”的地方集会做演讲。我的兴趣是绿色哲学的历史基础，因而，我为听众讲解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皮特·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等人的思想。坦率地讲，在接下来描述这种历史联系的讨论中，我做好了接受称赞的精神准备。但是，我所感受到的却是一些人带有敌意的反感。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是我没有意识到绿色分子正在讨论的是以前从未讨论过的东西吗？还是我没有意识到它与传统政治的明显区别？

我冒犯了绿色精神的一个根本性方面，它认为，生态主义实际上是关于一个世界新秩序和一种新的“生活政治”的(借用绿党的标语)。在《现代环境主义的根基》中，我由于建议绿色分子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吸收到他们的分析中来而加重了这一



“过错”。这是一块面对着绿色公牛时的红色遮布，它正在由于是“来自那些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的陈腐思想家的太多愤怒”而被拒绝考虑。^[1]

尽管这种习以为常的批评，作为那个“邪恶势力”即马克思主义左派中一个“已经过时”的思想家和成员^[2]，我打算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努力拓展与深化红色立场和绿色立场之间近来就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而展开的争论。这是因为，我不同意艾德里安·阿特金森(Adrian Atkinson)的做法。他将其贬低为这只是两种观点之间的一种“辩论”，而在实践中没有显示出根本性矛盾。

的确，在红色的绿色分子和绿色的绿色分子之间存在着许多联系(这些术语同时用来描述激进的生态主义者或“生态中心主义者”，以作为“浅层的”绿色分子或“环境主义者”即技术中心论者的对立面，而他们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参见第二章)。然而，如果说红色的绿色分子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绿色的绿色分子则更多地受惠于无政府主义。而且，尽管这两者经常在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中合而为一，它的要素组成了现代生态乌托邦和默里·布金(Murray 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的一个模板，但二者之间也存在重要的——有可能难以调和的——区别。

在激进联盟和红绿网络目前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托尼·本(Tony Benn)给出了原因：

直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平等、民主、责任、国际主义和道德)得以重建之后，人们才能真正建立起他们与由于这些原则的优先性而分裂的运动的非机会主义的真实联系。^[3]



我认为现在是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了，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这一个过程——一个并非只具有学术重要性的过程——做出贡献。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了危机，危机的影响比从前更大程度地扩展到了全世界。与此同时，经济衰退和紧缩已经使老中心地带的制造业大伤元气，而人们顽固地拒绝承担走出萧条状态的代价，资本主义的回应是更深入地进入第二、第三世界以寻求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料来源。

目前寻求建立的一个新的、更“自由”的关贸总协定(GATT)代表着一种把每个人都带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努力。这蕴涵着一个既非社会主义者，也非绿色分子所希望的社会——一个有着较高水平商品产量和较低水平人类需要满足的、享乐主义消费社会——的进一步膨胀。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政治上无权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地被边缘化，并且实现利润增长的环境成本也越来越大。但是，由于这些问题植根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现存根源，不存在从根本上加以分析与解决希望，社会不公正和环境退化这两个祸害即使人们已经认识到它们的存在，也仍将继续扩大。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高峰会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尽管某些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和其他杰出的政治人物都已正确地认识到这些难题和它们产生的原因，西方领导人顽固地辩护跨国资本继续以同样的旧方式运作的“权利”，并提出陈旧的马尔萨斯(第三世界)的“过度人口”论调作为他们对产生原因的解释。在面对起草全球协议、条约和其他协定以采取应对社会与环境难题的根本性行动时，他们都大打折扣、推诿甚至直截了当地拒绝签署这些文件，或者更不诚实的是，他们虽然签了字，但回家后却依然按照旧政治行事。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左翼和绿色分子都期待着他们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而这并没有发生。左翼分子 20 世纪 80 年代在几乎全世界的混乱状态已经得到广泛描述，而向我们承诺用一种“新政治”来代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绿色分子也正在走向衰弱。20 世纪 80 年代初，绿色分子在欧洲获得的选举支持已大幅度减少。在撰写本书的时候，英国绿党正面临着危机，执行理事会中有一半人辞职，而成员已从 1990 年的近 20 000 人下降到 1992 年的 10 000 人。^[4]

既然现实主义但“安抚性”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绿色改良主义都未能构成对现状的一个严重威胁，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绿色分子重新主张人类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更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但是，尽管探索性的红绿联盟仍在继续，迄今为止，在那些正在进行的试探性的红绿运动“网络”中，还没有非常有力的、有效的、连贯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出现。我认为，这是由于以下事实造成的，即要把红色和绿色运动团结起来，就必须有效地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联合起来。无政府主义是比其他任何传统政治哲学都更强烈影响绿色运动的一个主义。这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容易，因为，与大众化的错误观念不同，把无政府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另外一种形式并非总是可能的。本书试图通过描述和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它们必须依其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来推动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本书着重强调和澄清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不同，目的是为未来任何试图填补二者之间的鸿沟并使生态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更重要力量的政治著述提出议程。它通过如下主张实现这一目标：建议绿色分子通过放弃那些更接近于自由主义及后现代政治的无政府主义方面而



更好地与红色分子协调；与此同时，红色分子通过复活那些我在本书描述与评论的社会主义传统而与绿色分子协调。这些传统包括非集中主义、社会自然辩证法以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某种程度复活和对重新发现我们作为生产者力量的强调。

笔者在本书的主要部分即第三章中强调，马克思主义观点为绿色分子提供了比仅仅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透彻的分析更多的东西，尽管后者也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上的一种辩证观点，这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者和技术中心主义者的看法而是同时挑战二者。马克思主义持一种社会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后者应当贯穿于绿色战略。正如在前文中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奉社会主义。而且，像我主张的一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以至于足以坚决地主张：自然的权利（生物平等主义）如果没有人类的权利（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我们应当从社会正义推进到生态学而不是相反。

许多绿色分子，比如舒马赫(E. F. Schumacher)曾认为^[5]，马克思主义是刻板的、不灵活的、决定论的、机械论的（而不是有机论的）、历史观点过分“科学化的”（在实证主义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缺少人性主义与精神向度，是一本包含一系列大多数被证明为错误的和在前瞻与含义上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预测的圣经。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表明，这些批评通常是部分或全部错误的。下文也许可以阐明这一点，虽然它不是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缺点的辩解。正如萨卡(S. Sarkar)所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发现真正的马克思……目的不是为了拯救马克思主义，



而是为了发现真理……”^[6] 乌尔里希(O. Ullrich)指出：

现在已到了最终抛弃用无休止的引经据典代替对新现象和个人思想的分析这一无聊游戏的时候。而且，这种方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本人不喜欢被叫做马克思主义者。从教条地遵从他大约一百年前所写内容的意义上说，他在今天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7]

我的第二个贡献是在第四章中概括了无政府主义的信条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贯穿着我所说的主流绿色分子(生态中心论者)和那些公开声称自己是“绿色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尽管我在结论(参见第五章)中将不会主张必须抛弃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我仍强调社会主义的与众不同及其它如何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主张生态中心论者的重点应转向后者。某些绿色分子可能回答说，这种转变已经发生，但我怀疑的是，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种转变的全部含义，诸如对一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经济或生物中心主义观念的放弃？

在此之前，我想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论述这些争论的相关背景。许多学者比如阿特金森、布拉姆威尔(A. Bramwell)和多布森断言，生态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如果不大幅度地加以改变，政治生态学纲领中的描述性和规定性因素就不能在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比如社会主义)内部适应生存。对多布森来说，这种特征尤其取决于生态主义对增长的极限和生物道德的接受(倡导对“非人”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尊崇和敬畏——依据其本身的权利而不是对人类的有用性)。^[8]阿特金森认为，这是种生态主义的乌托邦主义(尤其是在乌托邦社会主义之后的)。他指出：

自然权利使生态主义成为一个十分不同于保守主义、